

Gradual Progress and Great Transformation:

Demographic and Social Changes
in the Lower Yangtze Rural Area in Modern China




渐进与巨变：

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农村的人口与社会变迁

——以1931—1999年的峭岐为例

朱国宏 主编

 復旦大學 出版社

霍英东教育基金项目课题研究成果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Gradual Progress and Great Transformation:

Demographic and Social Changes
in the Lower Yangtze Rural Area in Modern China



渐进与巨变：

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农村的人口与社会变迁

——以1931—1999年的峭岐为例

朱国宏 主编

桂 勇 刘长喜 副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渐进与巨变: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农村的人口与社会变迁/朱国宏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9
ISBN 978-7-309-07756-8

I. 渐… II. 朱… III. ①长江三角洲-农村-人口-变迁②长江三角洲-农村-社会变迁
IV. ①C924.24②K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0244 号

渐进与巨变: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农村的人口与社会变迁
朱国宏 主编
责任编辑/宋朝阳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5.5 字数 574 千
201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756-8/C · 174
定价:58.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本书旨在对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农村的变迁图式进行剖析，力图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与相关理论进行对话。从资料方面来看，本书采取了剖析麻雀式的个案研究，搜集了大量1931—1999年江苏无锡峭岐地区的历史演变资料，其中包括人口、土地、技术、制度变迁等多方面的经验材料与数据。

本书共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对人口压力、经济增长与长江三角洲的社会变迁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并以峭岐地区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对人口增长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详细探讨。下卷以峭岐地区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对社会、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的发展历程展开了分析，探讨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变迁。

本书适合社会学、经济学等专业师生，以及相关领域研究者、爱好者阅读使用。

主编简介

朱国宏，1963年生，福建漳州人。198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现为上海商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哈佛帝国》（2002）、《朱国宏学术随想》（2000）、《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主编）（1999）、《经济学视野里的社会现象》（和李志青合著）（1998）、《社会学视野里的经济现象》（和桂勇合著）（1998）、《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主编）（1998）、《可持续发展：中国现代化的抉择》（1997）、《人地关系论》（1996）、《中国的海外移民》（1994）、《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1994）、《世界人口通论》（和潘纪一合著）（1991）。

目 录

绪论：人口压力、经济增长与长江三角洲农村的社会变迁	1
1. 研究对象、目的及背景	1
2. 江苏峭岐镇的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	3
3. 为什么对中国的前景感到悲观：汤普逊的依据	6
4. 中国如何发展：路径和方式	7
5. 中国为什么发展：一种探索性的理论阐释	11
6. 初步的结论及讨论	14

上卷 经济发展

第1章 引言：人口压力下的经济如何发展	17
1.1 研究缘起：人口压力下农村经济如何发展	17
1.2 农村社区的历史变迁：人口压力下峭岐的经济发展	20
1.3 研究方法：对峭岐地区的个案研究	26
1.4 本卷的内容安排	27
第2章 人口压力、中介变量与经济发展	28
2.1 如何解释长江三角洲农村的经济增长？	28
2.2 人口增长、制度与经济发展：贫困的循环是如何被打破的？	30
2.3 劳动力资源、非农化与制度变迁：资源利用问题	33
2.4 小结	39

第3章 历史演变 I：人口压力与“没有发展的增长”	41
3.1 从个体农业到集体农业：1949 年后的变化	41
3.2 人口压力、集体农业与要素投入的收益	48
3.3 过密化与没有发展的增长	57
第4章 历史演变 II：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与经济发展	62
4.1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经济发展	62
4.2 农业与工业：劳动力过剩条件下农村的经济增长	63
4.3 非农化与长江三角洲农村的经济发展	67
4.4 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变动	70
第5章 非农化进程：历史的断裂与延续	72
5.1 非农化：1949 年前的历史	72
5.2 从家庭手工业到现代工业：1949 年后的发展	77
第6章 人口压力、非农化与经济发展	83
6.1 人地关系变迁对非农化的影响	83
6.2 峭岐个案的历史变迁	86
6.3 人口压力、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初步的定量分析	88
6.4 小结	93
第7章 产权制度的变迁	94
7.1 经济活动：自由的权利与非农化	94
7.2 非农化组织的产权结构：社区所有制	101
7.3 改制：从社区所有制企业到私营企业	116
第8章 经济整合制度的变迁	128
8.1 市场机会、初始条件与经济发展	128
8.2 经济整合制度：作为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	137
8.3 从关系网络到自由市场：正式制度的发育与社会资本的消失	141

第 9 章 劳动力资源利用：人地关系与农业生产技术模式的选择	145
9.1 资源禀赋结构、要素投入与技术选择	145
9.2 江阴与峭岐的农业生产技术模式	150
9.3 劳动密集型品种的选择及其变迁	159
第 10 章 劳动力资源利用：非农化进程中要素的投入	163
10.1 非农化进程中的劳动力供给	163
10.2 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	166
10.3 非农化与劳动力价格的变迁	171
第 11 章 非农化与人地关系的变迁	175
11.1 增长中的发展：非农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175
11.2 土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要素收益的变动	184
11.3 从劳动力密集技术到劳动力节约技术：农业生产技术模式的变动	187
第 12 章 结语	193

下卷 社会变迁

第 13 章 引言：近代以来的农村社会变迁	199
13.1 研究缘起：农村社会变迁的问题	199
13.2 研究架构	200
13.3 研究方法	206
第 14 章 农业生产、制度变迁与阶层分化	207
14.1 农业生产的绩效与制度变迁	207
14.2 土地制度、非农化与 1949 年前的社会分层	223
14.3 制度变革、工业化与 1949—2006 年的阶层分化	233
第 15 章 公共治理：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政治权力结构变迁	251
15.1 乡村政治权力结构的初步转型	251

15.2	乡村政治权力结构的革命性变迁	260
15.3	乡村政治权力结构的重塑	268
第 16 章	从传统到现代：嬗变中的文化与社会资本	280
16.1	乡土底色、非农化与开放性	280
16.2	阶级伦理、社会运动与文化传统	284
16.3	制度变革、经济发展与现代价值观	287
16.4	文化变迁、社会资本与乡镇企业发展	294
16.5	社会资本的形成、规范约束与信任	303
第 17 章	工业化、制度变革与婚姻家庭	318
17.1	核心家庭化、功能变迁与亲子关系	319
17.2	婚姻变革、妇女地位与生育意愿	331
第 18 章	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350
18.1	衣食住行、消费观念与休闲娱乐	350
18.2	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社会变迁	361
第 19 章	结语	369
19.1	生产制度与农村社会阶层分化	369
19.2	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权力结构变迁	370
19.3	文化嬗变与社会发展	372
19.4	工业化与婚姻家庭变迁	373
19.5	观念力量与日常生活变迁	373
余论	375
后记	378
参考文献	384

绪论：人口压力、经济增长与 长江三角洲农村的社会变迁

1. 研究对象、目的及背景

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对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研究来探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迁过程及其成因。其中，“近代以来”特指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近现代时期；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the Lower Yangtze River Delta）一般指江苏镇江以东、通扬运河以南、浙江杭州湾以北地区。这一地区历来是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代表，受到近代以来许多学者的关注并对其进行研究，如陈翰笙 1929 年在江苏省无锡县^①的调查研究，乔启明、汤普森和陈彩章 1932 年在江苏江阴峭岐镇的调查研究，费孝通 1934 年在江苏吴江开弦弓村（江村）的社会人类学研究等。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已成为一个专门术语，对一个特定研究对象的指称。即使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也仍有不少学者把这一地区作为考察对象来开展课题研究，如刘翠溶（Liu, 1981）、费孝通（1986）、黄宗智（1992a）、曹幸穗（1996）等。本文也以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简称长江三角洲）作为研究对象，并以乔启明等人所选定的江苏江阴峭岐镇作为其代表，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试图通过对特定社区的研究来考察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迁问题，而 1932 年的调查资料提供了部分对比研究的基础^②；二是，峭岐镇在许多方面具有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代表性，它位于无锡北面，处于南京上海之间，离长江不远，在地理环境、气候、降雨、农副业、乡村工业等方面颇具代表性，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典型地方”（乔启明等，1984：7）。

本书如此选题，直接的原因有二。

其一是，作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几次现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之一，乔启明等人进行的江苏江阴峭岐镇调查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而在全面分析工农业发展状况之后，汤普森却得出了悲观的结论：“在考虑了所有这些经济因素，并且对分量较轻的社会因素予以一定的估计，我不得不对可见的将来中国生活水平改善的可能性感到悲观”（乔启明等，1984：172）。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分析得出悲观的结论并不令人

^① 即今无锡市的锡山区和惠山区。

^② 乔启明、汤普森和陈彩章关于峭岐的研究报告最初以《中国生命统计登记的一项研究》为题于 1938 年在美国俄亥俄牛津出版，1984 年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移译时易名为《近代中国人口统计的一项实验（1931—1935）》。该研究由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和美国迈阿密大学斯克里普斯人口问题研究基金会（Scripps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Population Problems, Miami University）合作进行，所形成的研究报告包括两个附录，其中之一是由汤普森撰写的研究报告“对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展望”。以下引文页码均为中译本页码。

惊讶。事实上,当时大多数社会调查研究[包括李景汉的定县社会调查、卜凯(J. L. Buck)的农户调查等]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不仅如此,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珀金斯(D. H. Perkins)在研究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时也还是对中国发展的前景不抱多大希望。他说(1969: 246—250):“人口的增长率从1949年以前数十年中每年不到百分之一一跃而为1954年以后的百分之二以上。……只要人口继续以每年百分之二或者更高的速度向上增长,那么,即使如此迅速地扩大现代资本的投入,也难以做到满足中国的需求。”事实是,中国的发展始终处于庞大的人口压力之下,1996年的总人口几乎是1932年的三倍,但中国的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最近30多年里。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在庞大的人口压力之下,中国的发展为什么能够成功?其社会变迁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如何解释这一过程?诸如此类的问题无疑是引人注目的,也是十分值得探讨的。

其二是,中国20多年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被视为一种奇迹,并引发了经济学者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诸多解释性理论(如Chen, *et al.*, 1992; 林毅夫等,1994;张军,1998)。相形之下,与此同时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迁却缺乏相应的系统深入研究。在一些研究中,中国的社会变迁被归为“变态的原型”而加以轻描淡写(霍夫亨兹、柯德尔,1995)。应当说,对深刻变化了的中国社会进行研究,其意义丝毫不亚于对迅速的经济发展的研究,但是,由于学术界更多地关心“现时式”的社会问题研究,这种“历时式”的社会变迁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正因为如此,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有学者呼吁对中国社会变迁问题进行研究,因为,“中国的改革已经为重新思考社会变迁理论提供了极丰富的经验材料”(甘阳,1994)。当然,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一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

此外,如此选题还有方法论上的考虑,那就是,以往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大多属于宏观研究,对微观社会研究不予重视,这也使其研究陷入“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注重微观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史学界已开始得到重视,并形成了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如黄宗智,1986,1992a;杜赞奇,1995)。一项由德国大众基金会资助的关于乡镇企业的系列微观研究,近几年来也受到了关注(见陈吉元、何梦笔等出版的系列著作)。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同样应当加强微观的研究,才能使我们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将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作为本书的研究课题,而研究方法上则侧重于微观研究。选择长江三角洲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考虑到:一则它代表了中国的先进地区,其经验之于中国其他地区有着代表性意义和一定的示范性;二则这一地区历来为社会学家所关注并给予研究,已成为一个特定概念,在本文中,还具有对比研究的基础。至于将“人口”和“社会变迁”并列作为关键词,主要是考虑到人口压力之于中国的特殊意义,正如费正清(1985)所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要联系人口问题去认识,人口问题是形成一般概念的必要前提之一。”

本书将侧重于探讨中国农村(长江三角洲)近代以来人口与社会变迁的过程及其原因,目的在于解决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认识和解释中国近现代的人口与社会变迁及其成因。在这一领域,中国社会史学科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也较少。一

般的通史类研究,大多限于近代以前或1949年以前(如周谷城,1986)。相关的研究,一方面见于相关的学科领域,如中国现代化史研究(张琢,1992;许纪霖等,1995)、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胡鞍钢,1989)等;另一方面见于时期性或时点性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形态研究(如陈吉元等,1993;曹锦清等,1995;周晓虹,1998)。这些研究并非专为中国社会史研究而设,而且大多属于宏观研究的范围,其研究取向也多为“现时式”的和对策性的。而国外对于中国近现代史问题的研究见于三个方面:一是通史类研究,晚近的著作一般包括了近现代部分,如谢和耐(J. Gernet)的《中国社会史》(1995)一直叙述到20世纪80年代;二是断代史类研究,大多数集中在近代,如杜赞奇(P. Duara)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1995);三是相关研究领域,成果最为丰硕的当推中国经济史研究,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6)、《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a)。通史类一般是宏观研究,而断代史类和相关领域研究则属于微观研究,并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与本书的研究不同的是,杜赞奇的研究更关心的不是社会变迁而是文化、权力与国家的关系;而黄宗智的研究虽然涉及社会变迁问题,但侧重点在经济变化上,特别是经济史上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业生产率问题、农业过密化问题等。

要了解和理解近代学者对中国现代发展的悲观结论为什么不能成立,进而了解和理解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迁史,套用现有的理论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唯一的途径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深入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探讨其社会变迁的规律^①。而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社会变迁问题,从研究上说,加强微观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仅限于宏观或定量的分析,难免会套用现有的理论和信念,而微观层面的信息,特别是借助于个案研究方法得来的第一手资料,有可能使我们得出不同于既有的规范认识的结论。而研究方法上则应遵循从史实到理论再到史实的原则。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我们试图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农村地区一个具体的代表性社区的深入研究来考察和分析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迁历程。

2. 江苏峭岐镇的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

峭岐镇为江阴市腹地,东接云顾路,西邻锡澄公路,北枕花山。在我们调查之初,全镇总面积43.81平方公里。1995年底总户数15643户,总人口49502人。辖有28个村庄,可耕地面积35227亩,山地面积167亩。应当指出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峭岐和今天的峭岐在地理范围上是有所区别的。这主要是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新中国成立后曾将峭岐的几个村划给相邻的青阳乡,1993年又将邻近的几个村庄划给峭岐。只是,就统计而言,可比的地理范围还是能够鉴别的。以20世纪80年代为例,1982年的几个基本人口数据和1932年的调查数据的对比如表1所示。

^① 柯文(P. A. Cohen)认为,中国研究应当打破20世纪50年代以来流行的“对西方冲击的回应”模式,应当从“欧洲中心观”转变到“中国中心观”上来,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柯文,1989);何梦笔(C. Herrmann-Pillath)认为,对中国进行分析,需要一种中间理论,它介于中国人现实的生活经历(“生活世界”)与一般经济与社会学理论之间。这种中间理论被他归为“社会型”(social type)(何梦笔,1996: 5)。

表 1 峭岐人口(1932、1982)

年 份	户 数	总人口	男	女	性别比	每户人口数
1932	4 579	21 864	11 558	10 306	112.1	4.77
1982	12 647	45 428	23 995	21 433	112.0	3.59

资料来源：顾纪瑞，“江阴县峭岐乡人口的近况”，载乔启明等著《近代中国人口统计的一项实验》，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4年，第183页。

从表1中可见，峭岐总人口增加107.78%，平均每年递增1.47%。但是，表1中的1982年峭岐范围小于1932年的峭岐，因为它不包括划到青阳乡的6个村庄。如果加上这6个村庄，则应加上520户、2200余人。这样，总人口将是47628余人，比1932年增加117.84%，平均每年递增1.57%。在可比的统计口径上看，峭岐在经过50年之后，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长。1982年的总人口是1932年的2.18倍。其中，性别比几乎没有变化，而家庭规模则明显缩小了。

由于人口的增长，峭岐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密度由1932年的607人/平方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1178.69人/平方公里；人均耕地面积由1932年的1.45亩减少到1995年的0.71亩；每平方公里所要养活的人口数由1932年的1029人增加到1995年的2116人。

这种变化还表现在峭岐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1932年的峭岐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而到1995年已成为一个以农村工业为主的小城镇，三种产业的结构比例依次是：5.80%、91.98%和2.22%；1932年，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高达87.6%，而到1990年已减少到13.65%（苏南地区平均数）；1932年的集镇人口中仅占7.82%，而1995年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28%（江阴市平均数）^①；1995年峭岐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状况参见表2。

表 2 峭岐的主要社会经济指标(1995)

指 标	数 值
面积(平方公里)	42
人口(人)	49 502
劳动力(人)	20 417
耕地(亩)	34 911
现价社会总产值(万元)	161 292
农业(万元)	9 360
农村工业(万元)	144 536
建筑业(万元)	3 819
运输业(万元)	681
餐饮业(万元)	2 896
国内生产总值(万元)	46 595

^① 峭岐的资料引自《江阴年鉴(1995)》，苏南地区和江阴市的资料则引自陈惠仁等著，《苏南人口现代化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指 标	数 值
1990年不变价农业总产值(万元)	4 701
种植业(万元)	2 810
林业(万元)	2
牧业(万元)	623
副业(万元)	1 016
渔业(万元)	250
1990年不变价工业总产值(万元)	144 536
人均分配水平(元/人)	3 442

资料来源：江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阴年鉴(1995)》，江苏年鉴杂志社，1996年，第358页。

应当指出的是，峭岐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线性发展过程。和整个中国的发展过程一样，峭岐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而言之，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即1930—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1999年为第三阶段。从经济方面说，第一阶段为缓慢间以衰退的阶段，第二阶段为快速间以波动的阶段，第三阶段为持续高速发展阶段；从社会方面说，第一阶段为传统社会阶段，第二阶段为以制度变迁为特征的社会变迁阶段，第三阶段为以社会全面发展为特征的社会变迁阶段；从文化方面说，第一阶段为传统文化阶段，第二阶段为传统文化的变革阶段，第三阶段为现代文化阶段。

当然，这只是一种粗略的概括。更具体地说，不妨以人口转变来观察这一过程的社会经济变化及其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在第一阶段，峭岐1931—1935年的人口出生率为45.1%，人口死亡率为38.7%，人口自然增长率则为6.4%；到1949年，出生率降到30%左右，死亡率降到20%以下，而自然增长率则在10%以上；而到1983年，三者分别为7.97%、7.39%和0.58%。也就是说，在第一阶段，峭岐处于人口转变的早期转变阶段，亦即，以死亡率率先下降为标志，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开始明显下降，人口增长不断加快；在第二阶段，峭岐处于人口转变的后期转变阶段，亦即，出生率和死亡率继续下降，直到人口转变的完成阶段，其间，死亡率持续下降，而出生率则在30%左右的水平上波动一段时间后才开始下降，因而，人口增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快速增长，70年代以后持续快速减慢；在第三阶段，峭岐处于人口转变的完成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已降到很低的水平，人口增长也几乎进入零增长状态。这三个阶段的人口转变特征与峭岐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是相联系的。在第一阶段，社会经济的缓慢发展，使出生率和死亡率也开始缓慢下降。在第二阶段，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出生率和死亡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人口转变前后两个时期不同的特征则是政策的作用所致，前一时期没有采取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因而，死亡率持续下降的同时出生率维持较高的水平，人口增长也较快；而后一时期则由于开展计划生育活动使出生率迅速下降，人口增长迅速减慢。在第三阶段，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使出生率和死亡率均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特别是，在生育问题上开始由政府控制的行为逐渐转变为自觉控制的行为。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峭岐的人口转变已由传统阶段转变到现代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峭岐的社会经济各个方面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既是在愈益庞大的人口压力下进行的,同时又反过来影响人口的变化。事实上,正如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的,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之所以如此迅速,一方面在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人口转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在于政府的政策推动作用,正是有效的人口控制政策的作用,使中国人口出生率比西方国家下降更快、下降幅度也更大。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短短 20 年间,中国就完成了西方国家用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被视为一种奇迹。不仅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状况也得到明显的改善(朱国宏,1996)。

3. 为什么对中国的前景感到悲观: 汤普逊的依据

由上可以看到,在近 60 年里,峭岐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完全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这是过去的许多学者所不能想到的,也是过去的许多研究者所没有预见到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在悲观论者之所以悲观的一个基本前提之下得到发展的,那就是,中国人口不仅在那些预言之后继续增长,而且增长率远远高于当时所能预见的程度。譬如,汤普逊在分析中国发展前景时感到悲观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当时的“人口自然增长相当快”,而那时(20 世纪 30 年代)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其实连 10% 都不到(参见表 1.2)。事实上,在后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峭岐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远远超过 10%,甚至高达 20% 以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研究中国历史上农业发展问题的珀金斯也正是看到了中国这种高达 20% 以上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才对中国的前景不抱任何希望。

这样一来,要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在庞大的人口压力之下得到发展,首先必须弄清楚庞大的人口压力为什么会使研究者得出悲观的结论。被研究者忽视的地方或没有预见到的地方,往往也就是原因之所在。

汤普逊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指代发展,并从农业和工业两个方面来讨论中国发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如果中国人要生活得更好,那就必须有更高的工农业生产能力”(乔启明等,1938: 127)。

汤普逊首先讨论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可能贡献。他不同意许多人关于中国的农业已经达到顶点的观点。他引用布克(即卜凯^①)关于中国农作物生产的调查数据说明,中国的农作物生产力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如日本单位土地的水稻产量比中国多 30%。因此,中国农业在种植重要作物方面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获得极大的收益。然后,汤普逊从提高农作物产量的三条途径——培育和选择优良作物品种、提高耕地质量和使用化肥以及改进农田的经营管理——讨论中国农作物产量提高的可能性。接着,他又讨论了中国土地利用现状,指出,当时中国的土地利用不充分,而且没有更好地利用荒地和发

^① 卜凯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主持了一项大型的调查项目,共调查了 22 个省的 38 256 个农户,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参见卜凯,1937。

后,他得出结论说,“根据目前正在使用的土地和有待耕作的土地的质量上的差别,进行合理的折算,人们设想中国的农产品可增加一倍。我认为这个估计是比较宽的。假如再加上通过上述改进农业的措施所增加的产品,那么中国扩大农业生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可以为多于现有人口一倍的人提供维持目前低下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农产品;中国也可以为和现有人口相同的今后两三代人增加大量产品,使他们过上富裕的生活”。然而,问题在于,中国有着相当快的人口增长,因而在考虑未来 100 年的前景时,汤普逊又指出,“在我看来,只要现在的这种鼓励生育的社会观念维持不变,一切中国农业的可能改进和新土地利用都没有多大作用”(乔启明等,1938: 137,148)。

那么,工业化是否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呢? 汤普逊从自然资源、资本、人力资本、市场和经济组织的类型五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但是,结论同样是悲观的。因为,中国并不具有像世界上其他某些国家那样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而且,在今后一两代的时间里,资本短缺可能是阻碍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人力资本方面,则很可能在至少两三代的时间里,中国的工业将因缺乏受过训练的管理人员和实际操纵机器的工人而受到严重阻碍。再从市场条件来看,中国商品在国外市场的可能增长将与国内市场的增长同样缓慢,即使中国工业产品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扩展达到其最大限度,工厂也不可能迅速吸收大量人口。从中国的工业发展计划来看,由于没有一个实际的、全面的经济发展计划,或者即使有了这样的计划而没有实行这项计划的意志和力量,中国的经济发展肯定也将是缓慢和游移不定的,结果这种发展很可能带来浪费和混乱。正因为如此,汤普逊指出:“凡是读了到此为止的全部论述的读者将不难预见,在今后三四代人的期间,在工业发展可能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带来多大的改善这个问题上,将会得出什么结论。某些工业工人的生活条件可能稍稍得到改善,同时,生活在能够维持良好健康的生活条件下的人口的绝对数目也无疑将大量增加,但是对于广大农民,甚至对广大的工人来说,看来改善的希望是很小的,除非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根本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我们考虑的这段时间内看来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乔启明等,1984: 169)

综合考虑了中国的这种工农业发展状况,汤普逊不得不对可见的将来中国生活水平改善的可能性感到悲观。他说:“关于对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展望,我觉得自己是个马尔萨斯的忠实信徒。”不过,汤普逊虽然对中国的未来感到悲观,但他并没有断言中国没有一丝发展希望,只是他不敢相信而已。他说:“当然,什么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后三四代的情况也不会总是这样。那时候,中国将认识到像西方那样的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优点,而且会向往只有低出生率才能带来的舒适富裕的生活。但是由于我还不能预见到中国许多青年人认为的今后几十年内将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我便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对 20 世纪广大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前景抱多大的乐观态度。”(乔启明等,1984: 172)

4. 中国如何发展: 路径和方式

中国之所以得到发展,而且是迅速的发展,部分原因是由汤普逊已经意识到的因素使然,但是,他不敢对此“抱多大的乐观态度”,更不敢相信竟然会发展得那么快;而另外部分原因则是由于汤普逊所没有或不能预见到的因素使然。

我们不妨同样从农业和工业两个方面来分析汤普逊预言的失败或错误之处。

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潜力,汤普逊的初始判断几乎都是正确的,尽管这种判断失之于过分保守。在对中国扩大耕地面积的可能性方面,他正确地意识到中国土地资源的扩大潜力,包括现有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开垦荒地。譬如,汤普逊注意到,在山区有很多土地可用于种植旱地作物,如土豆、甘薯、山药、果树、蔬菜等,但是,中国农民不管多穷,就是不愿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从他没有利用的可耕零块土地上获得额外的食物。又如,汤普逊也指出,中国可以利用离村子更远的山区来扩大耕地,从而大大增加中国人的食物品种并增进他们的健康;除了更好地利用山区之外,还有相当多的土地用现有的耕作方法是无力耕种的,但这些土地可以像美国半干旱的产麦区那样,用机器进行粗放耕作,但是,要利用这些土地就意味着要从事此项工作的农民进行一场耕作方法的彻底革命,或者建立一个有能力承担此项开发任务的强有力的政府,“这两件事在可预见的将来似乎都不可能发生”(乔启明等,1984:135)。还有一种扩大耕地的办法是发展灌溉,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灌溉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且中国是否能在新获得灌溉的土地上养活估计将增加的人口也是值得怀疑的。

也就是说,虽然汤普逊意识到中国扩大耕地面积的可能性,但是,又大大低估了这种可能性,特别是实现这种可能性的能力。在他看来,中国通过扩大耕地面积的努力所增加的粮食,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为多于现有人口一倍的人提供维持目前低下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农产品;二是为和现有人口相同的今后两三代人增加大量产品,使他们过上富裕的生活。对他来说,两者必居其一。然而,事实上,中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扩大耕地面积的努力,大大超乎汤普逊的想象,提供的农产品所养活的人口也远远超出汤普逊的估计。中国扩大耕地面积的途径,无非也是汤普逊所指出的那几种,亦即,通过更有效地利用小块土地、大规模地开垦荒地(包括汤普逊预见到的开垦东北的荒地)、大力发展灌溉等,而其规模之大、效果之好则完全出乎汤普逊的想象,包括他认为不可能发生的农民耕作方法的革命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正因为如此,才使中国的耕地面积在新中国成立后持续增加,从而所提供的粮食也大大增加,并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料。这也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养活持续快速增长的人口的主要原因。20世纪50年代中国耕地面积的变化速度和幅度可参见表3的资料。

表3 中国的耕地面积变化(1949—1957)

单位:亿亩

年份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耕地面积	21.24	21.61	22.11	22.75	22.84	21.96	23.08	23.33	23.34

资料来源:朱国宏,《人地关系论——中国人口与土地关系问题的系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2页。

同时,汤普逊也正确地意识到中国农业通过培育和选择优良品种、改善耕作质量和改进农田的经营管理等方法提高粮食产量的可能性。只是,他仍然不敢抱以太大的希望。因为,中国农民的习惯势力是如此的顽强,以至于农作效率肯定不可能有什么很大或很快的改变,因此,改进中国农业的进程将会是令人沮丧地缓慢。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最多也就是“修整两三英里到集镇的道路,也有可能挖一些新井,或者改造了一些老井使之从卫生的角度看是相当可靠的。富有的人家可能有了纱窗,大多数思想比较开通的人则用上了蚊帐。……一座现代化的学校也可能建立起来了”。话锋一转,他又说,“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相当于,